

Franz Kafka

Der Prozeß

诉讼

WINSHARES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奥地利] 卡夫卡 著

张荣昌 译

华夏出版社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Zweig
Kafka

Der Prozeß

Franz Kafka

诉讼

〔奥地利〕卡夫卡 著

张荣昌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诉讼 / (奥) 卡夫卡著; 张荣昌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9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7-5080-4366-1

I. 诉… II. ①卡… ②张…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199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诉讼

作 者 [奥地利] 卡夫卡

译 者 张荣昌

责任编辑 郭 宇

特约编辑 邱 林 赵志明

美术编辑 陈 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87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366-1

定 价 1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人生即诉讼

叶廷芳

卡夫卡在短促的写作生涯中一共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失踪者》（一译《美国》、《不明身份的人》，1912）、《诉讼》（一译《审判》，1912—1918）、《城堡》（1922）。正好在十年内写成。这十年也恰好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旺盛期。但卡夫卡创作的主要兴趣和精力显然表现在短篇小说方面。晚年他在嘱咐他的朋友勃罗德在他死后将他的所有作品“统统付之一炬”时，至少还提到六篇短篇小说，对它们不无留恋。但长篇小说他却只字未提。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不值一提，而是卡夫卡对待创作那种宗教般的严格，总认为自己的作品艺术上没有达到“最高境界”。

三部长篇中，唯独《诉讼》的写作过程最长，前后达四年！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卡夫卡的写作速度一般不算慢，《城堡》的篇幅比《诉讼》大三分之二，才花了半年。我们暂时不去追索它产生过程长的原因。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创作从1912年的成名作《判决》起即开始了“现代”的历程，而长篇小说则是严格说来从《诉讼》才开始的。要弄清卡夫卡创作上这个美学嬗变过程，需要扩大一些视野，概览一下那个时期文化艺术上的新思潮，即现代主义思潮。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诞生于1883年。20世纪欧洲的杰出文化精英们大多诞生于这个年代。文化艺术和人文领域的现代主义思潮，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孕育这时正横空出世，它迅速地刷新着人们的人文观念和审美观念，从而催生出名目繁多的流派，至20世纪的前30年为其高潮。其中声势最猛、席卷领域最广、卷入人数最多、影响最深远的当推以德奥为中心的表现主义思潮。它始见于美术，继而是文学、戏剧、音乐、电影、舞蹈等争相涌现。文学中的表现主义运动发生于1910—1924年，高潮至1920年。其领袖人物弗兰茨·韦尔弗（Franz Werfel）亦为布拉格人，与卡夫卡是同乡，那些年卡夫卡与其频繁往来，共同参加文学活动并讨论相关问题。

表现主义运动既是一次思想反抗运动，也是一场美学变革运动，对20世纪的德语文学乃至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就美学变革而言，这场运动深刻地经历了“反传统”的过程。它剧烈地颠覆了在欧洲长期居

主导地位的“模仿论”美学，而代之以“表现论”美学，即把艺术创作习惯于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转向对主观世界的表现；从强调外部的真实，转向内在的真实。卡夫卡创作的旺盛时期（1912—1922），正值表现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这股“向内转”思潮对卡夫卡的创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说，他是积极参加了的。表现主义最为推崇的两位思想家——尼采和弗洛伊德，也引起卡夫卡的关注，尤其是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对卡夫卡起过重要影响。再从卡夫卡的创作看，也留有表现主义的许多特征。诸如表现主义所强调的内在真实，所追求的梦幻世界，所爱好的怪诞风格，所崇尚的强烈感情，所习用的酷烈画面等等，都在卡夫卡作品中烙下鲜明的印记。而这些特征在卡夫卡于1908年发表的处女作《观察》这本小册子里是基本上见不到的，甚至他于1912年开始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还没有完全摆脱“狄更斯”即批判现实主义的模式。可见这股思潮来势之猛，影响之速。我们在另一位现代文学大师、瑞典的斯特林堡那里可以看到相同情形。

但正如某些杰出的现代文艺大师如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等很难用某个“主义”或流派来概括他一样，阅读卡夫卡的作品也不能仅用表现主义的标准去衡量它们。事实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等都向卡夫卡攀亲结缘，说明卡夫卡之所以被公认为现代的经典作家，就在于他不像多数流派那样昙花一现，而具有跨世纪的长效价值。奥秘就在于，创作对于他不是单纯的审美游戏，而是出自“内在的需要”，即通过文学手段将他内心中那个几欲“撕裂”的“庞大世界”引发出来。这是因为卡夫卡凭着他那圣灵般的智力，分明洞察到人类存在的危机，即那日甚一日的“异化”趋势，他急欲向世界敲起警钟，对人类生存状态及其合理性提出质疑。因此通过文学途径“将世界重新审察一遍”，成为他毕生的最大愿望，而且越到晚年，他越感到这一任务的“十万火急”，以至一切无助于这一任务的想法和行为他都要加以“无情镇压”，哪怕“一个男子生之欢乐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无情”地加以“放弃”，包括婚姻、家庭，甚至健康。这使得创作对于卡夫卡成了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无怪乎阅读卡夫卡那些代表性的作品，都让人感觉到作者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一种从深心发出的生命呼叫！这就不难理解，他的作品何以有着如此入木三分的真实，一种任何写作高手凭经验和技巧都“创作”不出来的真实！这就是卡夫卡的独特性，这就是出身表现主义而又胜于表现主义的卡夫卡。

卡夫卡诚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用任何理论语言阐述过他的哲学观

点。但卡夫卡无疑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并紧张地进行哲学思考的文学家。他用艺术语言所暗示的人类存在的焦虑及有关的一些根本问题，与哲学家们，尤其是存在哲学家们通过理论语言所阐明的观点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这也就是说，他把哲学引进了文学，并使二者成功地融合为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之前，存在哲学的创始人克尔恺郭尔和稍后的尼采引起他那么大的震动，在他之后，他在另一拨哲学家如萨特、加缪等人那里那么受青睐。所不同的是：所提及的这些哲学大师几乎都可以说是哲学家兼文学家，但我们不能说卡夫卡是文学家兼哲学家。因为前者是有意识地让哲学去“勾引”文学，使文学成为哲学的嫁娘和附庸，而后者则是将哲学提炼为文学的精髓，使之成为文学血族里的精神支撑，因而使文学更强壮、更尊严；同时，他把哲学变成了美学，使文学哲学融于一体，难分彼此，不仅受到文学家的推崇，也受到哲学家的敬重。因此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分量，相当程度上是由哲学铸成的。这是卡夫卡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

在指出了卡夫卡作品的哲学前提，首先是存在哲学前提之后，现在再来看《诉讼》。如前所说，此作断断续续写了四年之久！如果写一部传统式的故事性小说，根本无须如此费时！显然，作者是为了在这部作品中融进某种哲思。什么哲思呢？这就一言难尽了！卡夫卡自己也强调：他通过创作“总是想传达一些不可言传的东西”，即他感觉或感受到而不能用理论说清楚的问题。故卡夫卡的一些主要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后两部）都有多重解释性和逻辑的悖谬性。想要明晰地解释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若能抓住其存在哲学这一主臬，负担就会减轻些。首先就拿本书的译名来说吧：最初有人从英文译作《审判》，从德文原文看，没有错。但德文还有“诉讼”的意思。审判是一个案件的结果，而诉讼则是案件审理的过程。这就要从卡夫卡作品的总体精神对两种词义进行权衡。由于卡夫卡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从卡夫卡的各种体裁和形式的文字的内容来看，人的存在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诉讼过程。所以他的三部小说均处于未完成状态。《诉讼》的主人公虽然后来被处决了，但是它是没有经过审判程序的，而且小说也未因此而结束。

卡夫卡为了婚姻，曾经历了先后与同一位姑娘两次订婚、两次解约、长达五年的过程。这场反反复复、备尝酸甜苦辣的马拉松式的“婚礼筹备”让他尝够了人的生存体验，不啻是一个漫长的诉讼过程，难怪他把1917年的首次咳血归因于与菲莉斯关系的不可忍受的结果。肺病在当年是一种不治之症，咳血就意味着即将死亡。这正是生命被处决的一种内心体验。须知，卡夫卡写这部作品时，就在1914年与菲莉斯第

一次解除婚约后不久。在此后的四年里就有三年继续着这场恼人的生存“诉讼”。

小说既然以“诉讼”或“审判”为主题，内容就不可能不涉及“罪”与“法”。法学博士出身的卡夫卡，加上爱思考的天性，他不可能不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当然他不会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与读者来谈论这些问题。我们暂且撇开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但在西方一般的现代作家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的观念里都有这样的意识：在一个有罪的社会里，人人都沾上一份罪责（在我们这里也有“人生一世，谁能无过”或“法不责众”之说），只是你平时意识不到，或未经指出，你“忘”到脑后了！现在，作家通过一种“假定性”的手法，让你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震动，在剧烈的灵魂翻腾中沉淀出你的罪过来。当然这里的“罪过”也包括道德范畴的事情。上世纪40年代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和50年代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抛锚》等都是意在揭示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表现主义时期就有人涉及这一问题了，所谓“有罪的无罪者”和“无罪的有罪者”之类的说法在那时就出现了。因此我认为，卡夫卡的这部作品也是这一思潮的反映。只不过它更加形而上了。年轻有为、毫无过失的银行襄理约瑟夫·K在30岁生日那天早晨，接受到的不是鲜花和蛋糕，而是一道逮捕令！这样的晴天霹雳他怎么肯接受？！但在调查真相的过程中，他先是慷慨激昂地抗议、辩护，甚至谴责法庭的藏污纳垢、贪赃枉法。但越到后来，他越服气了，以至最后被人提出去处决时，他不但毫无抗议之意，而且还十分顺从地协助两个刽子手行刑。为什么？因为在申诉过程中，他也进行了自我反省，他渐渐发现自己在日常工作甚至在申诉过程中也常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罪的。于是，这里的所谓“罪”，就有两重意思：在形而下的法庭上，即在根据现实法律行事的法庭上，约瑟夫·K是没有罪的；但在形而上的法庭上，即绝对正义的法庭上，他又是犯罪的。这一思维反映了卡夫卡的自审意识。所以有人认为，卡夫卡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既控诉世界，也控诉自己。

《诉讼》“在大教堂里”章，有一处写到在意大利一座教堂里神父对K讲的一个寓意深奥的故事：说是一位乡下人想进法的大门找法，苦等一辈子也未允许进去的故事。这可以说是《诉讼》的画龙点睛之笔，所以卡夫卡把它作为独立的短篇小说对待。从理论上讲，“法”代表公平和公正。在现实中，法的形式或法的大厦随处可见。然而在卡夫卡看来，真正的法是可等而不可得，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这个乡下人成了“等待戈多”式的“傻汉”！这是所揭示的人的生存的悲剧性处境。卡夫卡对“法”、对真理这些概念有着宗教

般的认真，他和尼采一样，认为寻求这类东西都是徒劳的。因此《城堡》中的主人公寻求也好，《诉讼》中的主人公申诉也好，无不无果而终。

在阅读卡夫卡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关键词必须注意，即“悖谬”（paradox）。这是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也是他的重要艺术秘诀之一。悖谬，一个事物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或互相抵消。这本来是一个哲学概念（哲学中一般叫悖论），它贯串在卡夫卡的思想、生活与行为之中。同时，他也把它变成美学，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甚至他的生活态度也体现着这一法则。当悖谬变成美学的时候，在他的创作中构成一种“黑色幽默”式的悲喜剧情趣，读后让人感到一种“引起愤怒的明了性”（卢卡契）。《城堡》的主人公一心想进城堡，不过想开一张临时居住证，奋斗一生而不得，当他奄奄一息，不需要它的时候，却又给他了！《法的门前》那位乡下人，到快死的时候，又说这大门就是为他而开的！

卡夫卡之所以被称为“现代主义”作家，因为他与传统文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写法，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带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角度。因此若用传统的人文理念和审美标准来阅读他的作品就会一无所获。他写的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激起他想象的事情。他的作品不是要诉诸你的情感，而是要激发你的理智。他写的许多事情，看起来似乎荒诞，却保存着你平时不易发现的真实。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卡夫卡。

2007 年夏于北京

主要人物表

约瑟夫·K——一家银行的襄理。

格鲁巴赫太太——约瑟夫·K的女房东。

比尔斯特纳小姐——打字员，约瑟夫·K的邻居。

贝托尔德——一名大学生，为法院工作。

卡尔——约瑟夫·K的叔叔，也是K的监护人，一个乡下小地主。

胡尔德——律师。

莱妮——律师的女看护和情妇。

埃尔莎——酒吧女招待，约瑟夫·K的情人。

蒂托雷里——画家，为法院工作。

布洛克——陷入一场诉讼的商人。

蒙塔克小姐——比尔斯特纳小姐的女友。

哈斯特勒——检查官，约瑟夫·K的朋友。

目 录

人生即诉讼 /1

被捕 /1

先与格鲁巴赫太后至
比尔斯利纳小姐谈话 /11

初审 /19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 大学生 办公室 /29

鞭笞手 /43

叔叔 莱妮 /48

律师 工厂主 画家 /60

商人布洛克 解聘律师 /89

在大教堂里 /107

结局 /121

比尔斯特纳的女友 /125

检察官 /130

去埃尔莎那儿 /134

同副经理的斗争 /135

房屋 /138

看望母亲途中 /140

出版说明 /142

马尔科尔姆·帕斯莱伊的补充说明 /143

名家评论 /147

卡夫卡生平 and 创作年表 /149

被捕

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因为一天早晨他没干什么坏事就被捕了。每天早晨八点左右给他送早餐的他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厨娘这一天没露面。这种事还从未发生过。K又等了一会儿，倚在枕头上看见住在他对面的那位老太太正以一种对她来说异乎寻常的好奇打量着他，但是随后他便感到既诧异又饥饿，便拉了拉铃。立刻有人敲门，一个他在这所公寓里从未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身材修长，却长得结结实实。他穿一身紧贴在身上的黑衣，这身衣服像旅行装那样有一些褶裥、口袋、带扣、纽扣和一条腰带并且因此而显得特别实用，虽然人们弄不清，这种衣服是用来做什么的。“您是谁？”K问道，并立刻在床上半坐直身子。可是来人却没理会这个问题，仿佛人们必须忍受他的到来似的，他只是自顾自地说了句：“您拉铃了？”“安娜该给我送早餐来了。”K说，并试图先缄默不语，通过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来断定此人究竟是谁。但是此人没容他长时间打量自己，而是转身走到房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对某个显然是紧挨着门后站着的人说：“他想让安娜给他送早餐来。”隔壁房间里随即响起一阵短促的笑声，从声音上听不出来，是不是有好几个人在笑。虽然这个陌生人并没从笑声中听出他不会是先就已经知道了回答，但是他仍还用一种禀告的口吻对K说：“这不可能。”“真新鲜，”说着，K就跳下床来，并迅速穿上裤子，“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在隔壁房间里，让我受到这样打扰，格鲁巴赫太太将如何承担责任。”虽然他马上意识到，这句话他不该说出口来，他这样做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陌生人有监督权，但是他又觉得现在这已经无关紧要。陌生人至少是这样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说：“您不愿待在这里？”“只要您不向我作自我介绍，我就既不愿意待在这里，也不愿意让您和我搭讪。”“我这是好意。”陌生人边说边自愿打开门。在隔壁房间里——K比自己的本意还更缓慢地走进这间房间——第一眼看上去情况几乎跟前一天晚上完全一样。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今天在这间摆满家具、覆盖物、瓷器和照片的房间里也许比平时稍多了一点空间。人们不是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这主要是因为，房间里的主要变化是有一个男人在这儿，此人坐在打开着的窗户口读一本书，现在他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来。“您本应该待在您的房间里的嘛！难道弗

兰茨没告诉过您？”“告诉了，您有什么事呀？”K说道，并把目光从这位新相识移向那个在门口站住了脚，被称为弗兰茨的人，随后又把目光移回来。人们从这扇敞开的窗户又看见这位老妇人，她怀着真正是高龄老人的好奇已经走到现在位于对面的窗户前，以便也可以继续观看这一切。“我要格鲁巴赫太太——”K说，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他想挣脱这两个男人，而这两个人所站的位置却离他远着呢，他想走开。“不行，”窗口的那个人把书往一张小桌子上一扔，站起身来说，“您不可以走开，您被捕了。”“看来是如此，”K说，“为什么呢？”随后他问。“我们无须把这告诉您。到您的房间里去等着吧。诉讼程序已经开始了，您会在适当的时候了解到全部情况的。我这样和颜悦色地跟您讲话，已经是超越我的职权范围了。但是我希望，这话除了弗兰茨以外谁也没听见，他自己就违反规定对您和颜悦色。如果您今后在您的看守们那儿也继续这样交好运，那您就可以放心啦。”K想坐下，但是这时他发现，除了窗口那把椅子，整个房间里没有一处可以供人坐的地方。

“您还会发现，我们说的全都是真话。”弗兰茨边说边和另外那个人一道向他走去。后者比K高得多，经常拍他的肩膀。两个人察看K的睡衣说，现在他得穿一件差得多的睡衣，但他们会保管好这件睡衣，也会保管好他的其他内衣的。如果他的案子顺利了结，会把它们全都还给他的。“您还是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好，别交给仓库，”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的衣物常常被侵吞，而且过一段时间人们就在那儿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不管有关的诉讼程序是不是已经结束。这样的案子不知要拖多久，尤其是在最近！最后您倒是会从仓库得到变卖衣物的款项，可是首先这笔款项本身就已经很微薄，因为变卖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出价的高低，而是贿赂的多少；其次，按照经验，这种变卖而得的款项几经转手，年复一年地拖延，就会越来越少。”K没怎么注意这些话，他并不高度关注他这种也许还拥有的对自己的衣物的支配权，他觉得弄清楚自己的处境要重要得多。可是在这些人面前他连思考都没法思考，第二个看守——他们只能是看守——第二个看守的肚子一再简直是友好地紧靠着他。但是他抬头一看，便看到一张与这个肥胖的身躯极不相称的干枯、瘦削的脸，脸上长着一个向一旁扭曲的大鼻子，这张脸越过K的头顶同另一个看守交换着眼色。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在谈什么？他们是哪个单位的？K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到处都很安全，所有法律都得到严格遵守，谁敢私闯他的家宅呢？他向来倾向于尽可能对一切淡然处之，在最坏的情况出现时才相信事态严重，并不事先为自己的未来操心，即便一切迫在眉睫。可是这里的这件事他觉得不对头，虽然人们可以把这件事整个看做一场玩笑，看做一场粗俗的玩笑，是银行里的同

事出于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他的三十岁生日而给他开了这么一场玩笑，这当然是可能的，也许他只需对着看守们的脸随便怎么哈哈一笑，他们也会跟着一起笑起来，也许他们是街角的听差，他们看上去并非不像那些听差——尽管如此，这一回简直可以说从第一眼看见看守弗兰茨的时刻起他就已经下定决心，决不把他也许对这些人占有的这种最微弱的优势拱手相让。至于说到人们以后会说他没有幽默感，K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却分明回忆起——平素他倒是并没有从往事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习惯——几件本身并不重要的事——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他和他的朋友们不一样，他毫不顾及可能会有后果，有意识地采取了不谨慎的态度并因此而受到了惩罚。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至少这一回不能让这样的事重演。这是一场喜剧，那他就要参加演出。

他还是自由的。“对不起。”他边说边快步从看守们之间穿过，走进自己的房间。“他似乎是理智的。”他听见身后有人说。一回到房间，他立刻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抽屉里一切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但是他在慌乱中却偏偏不能立刻找到他所寻找的身份证件。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行执照，拿着它就要去找看守，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份证明分量太轻，于是他继续寻找，最后找到了出生证。当他又返回隔壁房间时，对面的房门恰好打开，格鲁巴赫太太正要走进来。但是人们只同她打了一个照面儿，因为她一看见K便显露出尴尬的神情，一面道歉一面退了出去并极其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您进来呀。”K刚刚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但这时他拿着证件站在房间中央，还在看着那边那扇不再开启的门，听到看守们一声喊才回过神来，发现看守们正坐在敞开的窗户口那张小桌子旁边并且——如K现在看清的——在吃他的那份早餐。“她为什么不进来？”他问。“她不许进来，”高个子看守说，“您已经被捕了。”“我怎么会已经被捕了呢？就这样被捕了？”

“您又来了，”看守说，并把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往蜂蜜罐里蘸了蘸，“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回答。”“你们必须作出回答，”K说，“这是我的证件，现在你们也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特别是逮捕令。”“我的老天爷！”看守说，“您就是不能顺应您现在的处境，您似乎就是存心要无端地气我们，要知道，在您所有周围的人当中我们现在大概是对您最亲近的人了！”“是这么回事，您完全可心相信。”弗兰茨说，没把手里的那杯咖啡送到嘴边，而是用一种也许意味深长、却令人费解的目光久久地望着K。K不由自主地同弗兰茨交换了一下目光，但随后却拍拍自己的证件说：“这是我的身份证件。”“它们与我们有什么干？”高个子看守已经是在嚷嚷，“您表现得比一个孩子还坏。您想干什么？您同

我们这些当看守的讨论证件和逮捕令，您以为您这样做就可以迅速了结您这桩该死的大案了吗？我们是低级职员，几乎不认得什么身份证件，除了每天看守您十个小时并为此得到报酬外，同您的案子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有了解到，我们为之效劳的高等行政机关在发出这样一份逮捕令之前是详细了解过逮捕理由和被捕者本人的情况的。在这方面不会出什么差错。我们的机关——据我所知，不过我只知道级别最低的职员——不是到老百姓当中去寻找罪责，而是如法律所说的被罪责所吸引并且不得不派我们看守外出执行勤务。这是法律。哪会有什么差错啊？”“这种法律我不懂。”K说。“那对您来说就更糟啦。”看守说。“这种法律也许只不过是存在于你们的头脑中。”K说，他想用某种方式摸透看守们的想法，使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或者让自己的思想被他们采纳。但是那看守只是作出拒绝的表情说：“您会尝到这法律的滋味的。”弗兰茨插话说：“瞧，维勒姆，他承认，他不懂法律，可又声称自己无罪。”“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们什么事也没法让他理解。”另一个说。K不再搭理他们；我非得，他想，让这两个最低级的职员——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用这一套胡言乱语把我搞得糊七八涂的吗？他们在谈论他们根本不懂的事，他们只是因为愚蠢才显得自信。跟一个智力水平与我相等的人谈上几句，什么问题就会一清二楚，何苦跟这些人啰唆个没完。他在房间的空地上踱了几个来回，他看见那边那个老妇人把一个更老态龙钟的老头儿拉到窗口，她抱住那个老头儿。K必须结束这一场闹剧：“你们带我去见你们的上级。”他说。“如果他想见您的话，早了不行。”被叫做维勒姆的那个看守说。“我劝您，”他补充说，“到您的房间里去，保持镇静，等待对您作出处置。我们劝您，您别胡思乱想分散您自己的注意力，您得集中精神，会向您提出严格的要求来的。您这样对待我们，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好意，您忘记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至少现在与您相比我们是自由的，这可不是一个小小的优势。尽管如此，如果您有钱的话，我们还是乐意从那边的咖啡馆给您买一份简单的早餐来。”

K默默站立了一会儿，没理这个建议的茬儿。如果他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甚至起居室的门，这两个人也许根本不敢阻拦他，也许走极端倒是最简单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不过，他们或许真的会抓住他，而他一旦被撂倒在地上，现在他在某些方面对他们保持着的全部优势也就丧失殆尽。所以他宁可采取稳重的解决办法，听凭事态自然发展。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无论是他，还是看守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他扑到床上，从盥洗台上拿起一个漂亮苹果，这是他昨晚留下来准备早餐时吃的。现在它便是他唯一的早餐了，并且无论如何，正如他咬

了第一大口时所确信的那样，比他通过看守们大发慈悲本可以得到的那家肮脏的通宵营业咖啡馆的早餐强多了。他感到舒服并且满怀信心，虽然今天上午他没到银行去上班，但是凭他在银行里担任的比较高的职位，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谅解。他要说出真实原因来吗？他打算这样做。假如人家不相信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他就可以让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也可以让那边的那两位现在也许正在向窗口行进的老人作证。K感到奇怪，至少从看守们的思路出发他感到奇怪：他们将他赶到这间房间里并让他独自待在这儿，在这里他有十种自杀的办法。不过同时他也在问自己——这一回是从自己的思路出发——他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就因为这两个人坐在隔壁并截获了他的早餐了？所以自杀就是毫无意义的事了，即使他想自杀，由于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也就下不了这个手了。假如看守们的智力不是这么迟钝的话，那么人们倒还可能会以为，由于同样的考虑他们也认为让他单独待着没什么危险。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现在不妨来看一看，他是怎样走到一只他藏着一瓶好烧酒的小壁橱那儿，他是怎样先干了一小杯以弥补早餐的损失以及他怎样喝第二小杯给自己壮胆，他喝这第二杯酒纯粹是出于谨慎，是以防不测的。

这时，隔壁房间的一声叫喊吓了他一大跳，吓得他一个劲儿直用牙齿磕碰酒杯。“监督员叫您去！”有人叫喊。吓了他一跳的，仅仅是这叫喊，这一声短促、不连贯、军令式的叫喊，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竟是看守弗兰茨发出的。这道命令本身很受他欢迎。“终于来了！”他应了一声，关上壁橱，立刻快步走进隔壁房间。那儿站着那两个看守，仿佛这是桩不言而喻的事情似的把他又轰回他的房间。“您是怎么回事？”他们嚷嚷，“穿了睡衣去见监督员？他会让人揍您一顿，我们也得一起挨打！”“别管我，见鬼！”已经一直被推回到衣箱旁边的K叫喊，“既然把我从床上拽起来，那就别指望我穿戴得整整齐齐。”“这无济于事。”看守们说，K一叫喊，他们便总是心平气和，甚至几乎变得忧伤起来，从而把他弄糊涂或使他恢复了几分理智。“可笑的礼节！”他还在咕哝着，却已经从椅子上拿起一件上衣并用双手撑住它一会儿，仿佛他是在让看守们判断这件上衣是否合适。他们摇摇头。“得穿一件黑上衣。”他们说。K当即把那件上衣往地上一扔说：“这还不是主要程序中的审讯嘛。”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看守们笑了笑，但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得穿一件黑上衣。“假如我因此而可以使事情快些了结，我倒也不在乎这个。”K边说边自己打开衣箱，在一大堆衣服里寻找了好久，找到了他那件最好的黑色衣服，一件因紧贴腰身曾在熟人当中几乎引起轰动的西装上衣，又另外挑出一件衬衫并认认真真

穿起衣服来。他暗地里以为，由于看守们忘记了强迫他去洗澡他已经取得了加快整个进程的效果。他观察他们，看他们是否也许还会想起这件事来，但是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一点，维勒姆倒是没忘记派弗兰茨去向监督员报告 K 正在穿衣服。

当他穿戴停当时，他便不得不紧挨着维勒姆的前面穿过空落落的隔壁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这间房间的两扇房门已经打开。K 分明知道，自一些时候以来这间房间里便住着一个比尔斯特纳小姐，是个打字员，她通常都是很早便去上班，很晚回家，跟 K 无非就是见面时互相打个招呼而已。现在那张小床头柜已经从她的床头那儿移到房间中央权当审判台，但见那监督员就坐在它后面。他跷着二郎腿，一条胳膊搭在椅背上。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三个年轻人，他们正在观看这位小姐的照片，它们插在一块挂在墙上的草垫上。在开着的窗户的把手上吊着一件白色女式衬衣。对面的窗口上又趴着那两个老人，可是他们的阵容扩大了，因为在他们身后，远远高出他们之上，站着一个穿一件前胸敞开着的衬衫的男子，此人正在用手指捻着他的带红色的山羊胡。“您是约瑟夫·K？”监督员问，或许只是为了把 K 的涣散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吧。K 点点头。“您对今天早晨的事一定很感到意外吧？”监督员一边问，一边用双手挪动着摆在床头柜上的不多几件物品，蜡烛和火柴，一本书和一个针线包，仿佛这是他审讯需用的物件似的。“当然，”K 说，他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快意，他终于面对一个讲道理的人，可以和他谈谈自己的事情了，“当然，我感到意外，不过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不十分意外？”监督员问，他把蜡烛放到床头柜中央，把其他东西摆在蜡烛周围。“您也许误解了我的意思，”K 赶紧说，“我是说……”K 顿住并寻找一把椅子。“我可以坐下吧？”他问。“这不是通常的习惯。”监督员回答。“我是说，”于是 K 不再作间歇地说，“诚然，我感到十分意外，但是，一个人在世上活了三十年，独自闯荡，历经坎坷，对意外的事就有了心理准备，不把它们看得太重。尤其不会把今天这件事看得太重。”“为什么尤其不把今天这件事看得太重呢？”

“我不想说，我把整个儿这件事看做一场玩笑，我认为，所采取的这种动作似乎规模太大，不像是开玩笑。想必是公寓里的全体人员，还有你们全体人员也都参与进来了吧，这恐怕就超出一场玩笑的界限了。所以我不想说这是一场玩笑。”“完全正确。”监督员说，并察看着火柴盒里还有多少根火柴。“但是，另一方面，”K 接茬说并把脸转向所有的人，甚至巴不得转向那三个看照片的人，“但是，另一方面，这件事也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从这里得出这个结论的：我被控告了，

但是我没能发现一丁点儿可以让人控告我的罪行。但是这也是次要的，主要的问题是，我被谁控告了？哪个机构审理我的案子？您是公职人员吗？没有一个人穿制服，如果人们不想把您穿的衣服”——说到这里，他把脸转向弗兰茨——“称之为制服的话，这只是一套旅行装呀。我要求澄清这些问题，我确信，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后我们便能客客气气地互相道别了。”监督员把火柴盒拍倒在桌上。“您大错特错了，”他说，“这里这几位先生和我对您的案子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我们甚至对此案一无所知。我们完全可以穿最正规的制服，您的案情也不会因此而变坏一丁点儿的。我也压根儿不能告诉您，说是您被人控告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被人控告了。您被逮捕了，这是对的，更多的我就知道了。也许看守们胡说了些什么别的话，那也只是胡言乱语而已。但是即使我不回答您的问题，我仍还可以劝您，您就别去想我们以及人家将会对您怎么样，您就多想想您自己吧。您别这样大事喧嚷您觉得自己无罪，这扰乱了您在其他方面给人留下的并不怎么太坏的印象。您也根本就应该少说话，您方才所说的所有的话，哪怕您只是讲了几句话，我本来也都是可以从您的态度上判断得出来的，况且这些话也绝不是什于您特别有利的话。”

K 愣愣地看着监督员。他在这里接受一个也许比自己更年轻的人的说教？他为自己的直言不讳而受申斥？对于他被捕的原因以及谁下达的逮捕令他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他情绪激动，不受任何人阻拦地走来走去，挽起袖口，触摸胸脯，掠正自己的头发，从那三个人身旁走过，说：“这毫无意义嘛。”这三个人顿时便向他转过身来并和蔼可亲、但却严肃认真地看着他，而他则终于又在监督员的桌前站住。“检察官哈斯特勒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当然可以，”监督员说，“但是我不知道，这会有什么意义，多半是，您有一桩什么个人私事要和他谈吧。”“什么意义？”K 叫嚷，与其说感到恼怒，不如说感到惊讶。“您到底是谁？您希望有意义，却在表演这出最没有意义的戏？这难道不荒唐吗？这几位先生先是突然闯进我的家里，现在他们在这里悠闲地坐着或站着并让我在您面前作高超的骑术表演。既然我据称已经被捕，那么给一位检察官打电话还会有什么意义吗？好吧，我不打电话了。”“打吧打吧，”监督员一面说，一面向放着电话机的前室伸出手，“请打吧。”“不，我不想打了。”K 边说边向窗口走去。那一伙人还在那边窗口并且似乎只是现在由于 K 已经走近窗口自己的平静观看才稍稍受到了一些扰乱。两位老人想站起身来，但是他们背后的那个男子安慰他们。“那边也有这样的看热闹的人。”K 对监督员大声叫喊并用食指指着外面。“离开那儿。”他朝那边喊叫。那三个